

漢娜鄂蘭及其思想簡介

陳品元

前言

最近應朋友的邀約，一同欣賞由佳映娛樂出品的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在看電影前只知道漢娜鄂蘭是一名猶太裔女性思想家，在政治、社會方面頗有其獨特的見解，而這部紀錄片性質的影片則講述她旁聽納粹戰犯審判後的心得紀錄，是如何為她帶來一生中最大的爭議。而在影片播放的過程中，演員所飾演的漢娜總是手不離菸，總是充滿活力，勇於挑戰他人的觀點、提出嶄新的思想，尤其她所提出的「平凡的邪惡」——只要一個人拒絕思考、盲目服從領袖、放棄道德良知，即使不是精神異常也可能成為邪惡的一份子——深深的撼動了我，不僅為猶太人慘遭屠殺的悲劇發生原因提供了全新的審視角度，更使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電影海報

人重新檢視自身的所作所為，也促使我進一步認識漢娜鄂蘭，這位勇於顛覆世界的偉大女性。

一、漢娜鄂蘭簡介

約漢娜鄂蘭（Johanna Arendt）於1906年在漢諾瓦出生，成長於柯尼斯堡，大家都暱稱她為「漢娜」。漢娜來自富裕的猶太家庭，和德國同化相當深，「猶太人」三字從未是被強調的字眼。1914年戰爭爆發，因俄軍入侵，一家轉而逃向柏林。1924年她進入馬爾堡大學就讀，遇到啟蒙老師雅斯培與海德格，她與海德格兩人相愛，這份愛情即使最後因漢娜的猶太人身分和海德格為納粹服務而產生差異，仍沒有改變。漢娜在學習的過程中深受法蘭克福學派影響，例如漢娜認為：「你的眼光要迴避那些歷歷的軌轍，要恨惡那些黨同伐異的殘暴，要追求尚未被一般人認可的觀念，這種態度才是思想突破的最後希望。智識本身不可能提供一切的答案，如果智識提供一切的答案，它本身就變成一個霸權。」這種獨立思考的態度就是其思想的明顯風格。

1933年3月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成為漢娜一生的轉捩點，希特勒攻擊共產黨員，漢娜雖不是共產黨員但因庇護黨員受牽連而被捕，被拘留了幾天後釋放，有感於德國已不再安全，她決定離開德國逃往巴黎。漢娜稱呼法國是「歐洲最大

的移民招待區」，描述巴黎「為無家的人提供第二個家…別的城市不願看到的景象—散漫、懶惰、閒晃—巴黎卻歡迎每個人這麼做。」在法國期間，漢娜和許多著名人士成為好友，例如沙特和班雅明，班雅明生前來不及出版的手稿甚至是交由漢娜代為處理出版事宜，可見交情之深厚。1936年在巴黎漢娜遇到海因里希（Heinrich Bluche）並結婚，海因里希成了漢娜一輩子的伴侶和摯友。在漢娜三十出頭時她的思想已逐漸成形，認為猶太人應該要喊出心聲、積極抗議，而不只是低姿態的期盼自己不要受迫害。這和當時巴黎的猶太官方組織（Le Consistoire）力求猶太人避免政治的立場非常不同。1939年德法戰爭法國失敗後，漢娜和海因里希因不具國籍與其他德國難民被送往勞改營，但後來幸運地逃出，並在1941年前往紐約。在紐約時期，漢娜與丈夫都為美國公民，也是她著作出版的高峰期，例如《極權主義的起源》、《平凡的邪惡》、《人的境況》等等。漢娜持續的關注猶太人的權利與命運，但這不代表她無差別地認同所有的猶太組織，例如1948年以色列建國時期，她批評某些激進的想擴張以色列領土、侵略巴勒斯坦的猶太組織，認為他們罔顧阿拉伯人的權利，以此看來，我認為在漢娜心中或許擁有著真正的種族平等。但正因為她太過公平，對猶太組織或猶太人並不流露過多的同情，導致她的思想與著作常被批評，尤其是1963年《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出版後，掀起巨大波瀾，引來滔滔不絕的爭議跟批評。不僅是猶太組織，甚至是她的好友也因為跟她思想上的歧異而大吵架或絕交阿等等，但漢娜並不因此而妥協。以下簡單介紹讓漢娜成名的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和讓她備受爭議的著作《平凡的邪惡》。

二、極權主義的起源

這本書構思的起點和結束都針對納粹的死亡集中營，在納粹的極權主義運動下，恐怖活動和種族屠殺氾濫，漢娜想要探討這種無法預見且無法想像的事情到底為何會發生？人的尊嚴、理性為何在那段時間裡完全失靈？漢娜追溯過去兩三百年的歷史，最後整理出脈絡發展：反猶主義與帝國主義，共同造就了極權主義。

反猶主義中，她說明猶太人自從古代聖城被滅、喪失國土之後，流離到歐洲各個皇宮或貴族中擔任宮庭猶太人，意即私人財務祕書，並在歐洲串連起一個資金流通的網絡所以備受重視。但被驅離家園的苦難仍被張顯在許多猶太著作當中，不斷強調彼此的敵對因素、以強烈的主觀或偏見追溯自己民族受迫害的歷史，甚至帶有一種「寄人籬下才能受保護」的普遍信念。但是十九世紀後，君王和政府轉向興起的資產階級，宮庭猶太人的重要性下降，成為有錢卻沒有權力的階級，和社會各階級聯繫本因猶太人特殊的身分而薄弱，現在成了眾人眼中「無功而受祿」的階級、沒有與國家有著民族連繫的族群，就更令人討厭。而面對這種敵意，大部分猶太人並沒有團結反抗，反而是選擇退縮到自己的社會傳統中，不再參與居住國的政治和社會活動，而是轉向參與商業活動，所以在清除猶太人活動之前，在德國許多數一數二的銀行都是猶太人經營的。而政府也給予商業猶太人許多特殊權利、卻不是真正的信任，導致猶太團體始終與其他社會階層同化。甚至猶太團體中可能也有派系，例如富有猶太人不願意與貧困的同胞們分享財富，甚至在美國的猶太代表還曾反對收容德國猶太難民。

1930帝國主義開始在歐洲政治中大為流行，

而帝國主義的核心概念就是無止盡的擴張，發展背景主要是因為當時工業發展產生資本過剩的情形，必須占領新殖民地消化資本，也協助了極權主義的發展，歐洲帝國主義的擴張造成固有傳統正義的破壞，動搖人類權力的根基，並且因為殖民地與被殖民地的權力關係造成了所謂次等公民的出現，加深種族歧異的意識。漢娜描述到：

「在帝國主義的舞台上，因為一些人可以控制另外一些人，所以什麼恐怖的事情都會發生，在種族歧視的基調上，極權主義政府就產生了。」看著英、法、比利時等西歐國家成功的帝國主義擴張，在中歐和東歐流行的泛日耳曼運動開始在歐洲本土內擴張。這種新的「部落式民族主義」（tribal nationalism）開始找敵人，猶太人就成了敵對的對象，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失業、破產、憤怒的群眾發洩的出口。而在希特勒著作《我的奮鬥》中，將猶太民族形容成最壞的民族，合理化攻擊行為，使每個民族都可以蔑視猶太民族。在這個情況下猶太民族被剝奪了人權，沒有任何國家的法律可以保護他們，進一步造成納粹毫無忌憚的迫害猶太人。

極權主義中，漢娜提出了疑問：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會發生？怎樣發生的？漢娜在書中描述納粹的成功首先是集合了暴民（mob）的力量，這些暴民的特色是孤立、沒有清晰的階級歸屬或團體歸屬，而極權主義以宣傳來魅惑這些群眾，給他們支配全世界的妄想，在納粹的例子中，納粹宣稱猶太人意圖統治世界，是大家的敵人，同時又藉著陷害或謀殺的手段威嚇群眾使之忠誠。極權主義的領袖們總是在肅清自己身旁的親信，造成他人無法分散領袖的權力，漢娜把這種極權主義領袖心中這種滅絕他人的衝動稱為「根本惡」（radical evil），是一種征服全世界的慾望、無限權力的追求，一種證明自己什麼可怕

事情都作得出來的志得意滿。而與這種主動式的「根本惡」相較，就是「平凡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

三、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平凡的邪惡」一詞出自漢娜的著作《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艾希曼阿道夫（Adolf Eichmann）過去是蓋世太保軍官，在安全局總部任職官拜少校，負責安排猶太人的驅逐、撤退送到集中營處死的行動。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猶太情報人員綁架送到以色列送審，受審的罪名是迫害猶太民族、違反人道以及戰爭戰犯。漢娜沒有參加先前的紐倫堡大審，所以認為參與這次審判將會給她一個深入了解納粹的機會，但沒想到這番旅程及其後的紀錄思想把漢娜推入畢生最嚴重的爭議。

打從一開始漢娜就反對以色列總理綁架艾希曼的行為，她認為這場審判根本是用來宣告世人猶太人吃了多少苦的作秀，而且審判者充滿自憐和攻擊性的語調暗示這件案子根本不需程序就能知道結果。但必須釐清的是：漢娜對艾希曼應該對無數猶太人死亡這點負責沒有異議，她也覺得艾希曼應該受絞刑。她在親眼見到艾希曼之前總想像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病態的可怕殺手、邪惡的虐待狂等等，但她卻發現他不過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公務員，甚至只是個心智薄弱的小丑。艾希曼清楚的了解無數猶太人是因為他手下通過的公文、審核過的命令、批准同意執行處決手段而死。但他卻喪失辨別善惡的能力、拒絕思考行為的後果、盲目的服從納粹首領的指示。艾希曼甚至辯稱，他個人對猶太人一點敵意都沒有，還曾經擁有過許多猶太親朋好友，他總是說：「我沒

有親手殺害任何一個猶太人！」、「我只是遵從上頭的指示！」。所以漢娜將她的所見所聞匯集成一個概念：放棄道德良知、拒絕思考行為後果、盲從的依賴領袖就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並不是個怪物。但她這個想法卻引起軒然大波，常常被人誤解、指責為同情納粹、對猶太人不夠憐憫等等。學者們企圖證實漢娜的思想，例如在1961年，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米爾格倫進行了一項實驗：他在報紙上招募實驗協助者，讓他們拿著電擊控制器，若隔壁房間的學生答錯問題，就按下電擊開關，並且電壓會逐漸升高。駭人的是，儘管痛苦的尖叫聲不斷傳來，甚至到了喪失意識的程度，仍有高達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會持續按下開關到最高伏特數，只因他們被告知「實驗要繼續進行，這是必要的，你沒有選擇。」1971年的史丹佛監獄實驗更進一步演繹了這驚人的過程：一群心智正常，健康並友善的大學生，在實驗空間中扮演監獄內的兩派人馬。在短短六天內，角色扮演的遊戲讓他們從「學生」成為貨真價實的「看守」與「罪犯」，進行充滿暴力與壓迫的管制行為，直到局面過於失控而結束。這在在證明了，只要你停止思考、只顧遵從上級命令而不顧道德，要淪為平凡之惡的奴隸其實相當容易，根本無需超乎常人的歹毒或是精神異常，人人都有可能成為艾希曼。

再加上漢娜在書中指責當時許多猶太領袖竟然幫助納粹組織驅逐猶太人，因為這些猶太領袖相信如果有猶太人的「加入」會讓被驅逐者所面對的情況比較「溫和舒適一點」，她舉出一個例子，艾希曼在受審時提到在大滅絕開始之前僅是強制猶太人移民出境，艾希曼與猶太高層、甚至是巴勒斯坦猶太高層都積極會面安排德國境內猶太人遷出的事宜，但這些猶太高層對救援行動不感興趣，也無意要處理猶太人整體，而是要選擇

合適的勞力前往巴勒斯坦、他們未來的家園，這讓大多數猶太人腹背受敵，前方是德國納粹，後方是猶太人高層的選擇。她嚴詞批評：「猶太官員對猶太人本身扮演毀滅同族的角色，無疑是整個黑暗歷史中最黑暗的一章。」那這當然造成許多猶太人抓狂的反應，他們認為漢娜不了解猶太領袖在納粹統治後期扮演的角色、不體諒猶太人所面對的道德困境。當然，也是有人支持漢娜清晰、不偏頗的思辨。

四、結語

在電影中，我看到的是漢娜鄂蘭捍衛信念、不畏批評與威脅的勇氣，面對大眾與摯友的不諒解，她仍堅持看法，認為思想不應該因外力影響就輕言改變，她的堅毅和聰慧讓我印象深刻。拜讀著作後，對於漢娜鄂蘭更是敬佩不已。或許，我們不能說漢娜鄂蘭的思想完全客觀、正確，甚至漢娜本人也承認自己對某些議題了解程度不深，但我們可以肯定她必定是一個博學多聞、治學嚴謹的學者，例如「極權主義的起源」這本書中，中文版正文有486頁，卻包含超過1000個註釋、900篇參考書目，內容之深、範圍之廣讓我需要重複閱讀、查詢資料才敢說稍加理解，從她的著作中也發現她不僅挑戰普遍觀念，也嚴苛的對待自己的學問，常能發現她寫作的脈絡中，後一個思想永遠挑戰著前一個思想，這就是最欣賞漢娜鄂蘭的地方—不停思考，與自己開誠布公的相處、永恆地與自己捫心對話，而成為二十世紀重要的女性思想家。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